

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

林晓洁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20世纪初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获得的文献类收集品。1996年,荣新江师在德国考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德国国家图书馆中抄出其中的非佛经类文献,并买下部分较有价值的文书照片以便研究。先生于1998年发表《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对他的考察所得进行了介绍,文中首次指出本文考察的五个残片属于《新唐书》卷一七一《石雄传》的残片^①。去年先生将照片交给我,鼓励我作一个考释,遂成此文。

一、残片简介

本文所述《新唐书》残片的编号和尺寸为:Ch.2132v(无原编号),5.9×14.0cm;Ch.2286v(T III 62.1007),2.9×5.9cm;Ch.3623v(T III 62),7.2×10.0cm;Ch.3761(无原编号),4.3×14.6cm;Ch.3903v(无原编号),12.0×10.5cm。其中Ch.2286v(T III 62.1007)和Ch.3623v(T III 62)是第三次考察所得,但该次考察范围极广,包括库木吐拉克孜尔石窟、硕尔楚克及高昌故城和哈密一带,从编号上无法判定具体地点。另外三片无原编号,无法获知所出地点。这五片中除Ch.3761背面无字以外,其余残片均可看出是裱在刻本《增一阿含经》卷八的背面。图一所示为复原后的残页。

该残页版框高17.5cm,每栏宽0.8–0.9cm。从文字内容来看,这是《新唐书》卷一七一《石雄传》的末尾部分,Ch.3903v最左边一行的文字“李乌”等不属于传记本身。笔者看到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绍兴刻本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新唐书·石雄传》的缩微胶卷,卷末有尾题“李乌王杨曹高刘石列传第九十六”^②,残页最后一行文字正与其中一部分相符,因此认定该行为此卷的尾题,补全后可得该页录文如图二所示,其中该残页的文字中,“堞”字的“世”缺笔。由尾题向左空五行,第五行较其余为窄,应是版心,但因有残缺,已看不到鱼尾和任何

①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309–325页。

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

文字;对应的下半页 Ch.3623v 文字结束后向左餘五空行及已残的半行,也看不到任何标记。根据以上分析,知该残页的版式为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字体劲瘦。

关于该残页的版本年代,需要多方面考虑。从版式上看,半叶十四行,白口,左右双边的特征多见于宋版,元版亦有。从字体上看,翻检《中国版刻图录》收录的书影所见,该页的字体类似宋代浙江及附近地区的刻本,尤其与婺州(今金华)刻本《曾南丰先生文粹》(图三/1)^①相似,和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旧唐书》(图三/2)^②、金华刻本《圣宋文选》(图三/3)^③字体也颇神似,而与宋建本《新唐书》(图三/4)^④不同。因此,可初步判断该残页可能是宋代浙江及附近地区的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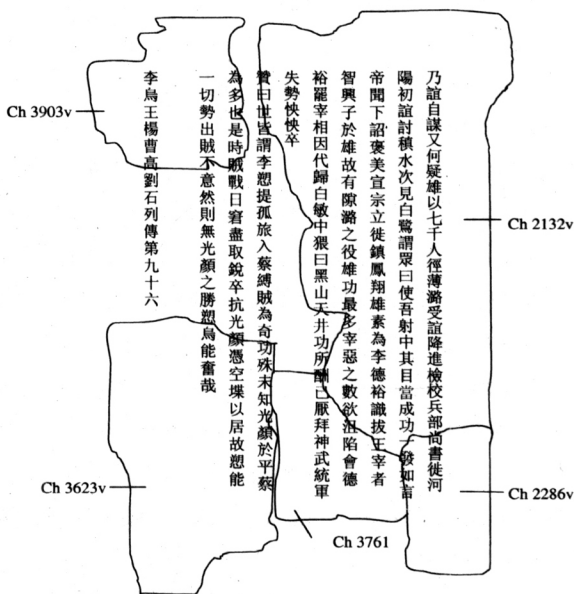
二、现存宋版《新唐书》概观

为了对残片的版本进行更准确的定位,首先需要将有记载的宋版《新唐书》及其版本特征作一个排比。

有关《新唐书》的版本,尾崎康先生在《正史宋元版的研究》一书的结尾



图一 吐鲁番出土《新唐书》残片复原图



图二 吐鲁番出土《新唐书》残片录文

①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图版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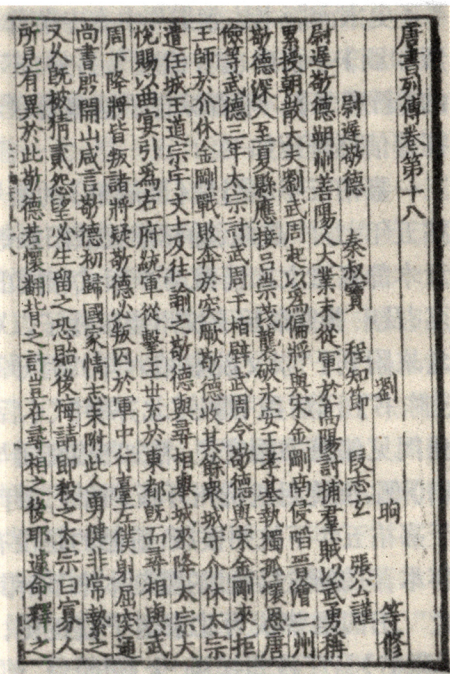
②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七四。

③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九二。

④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一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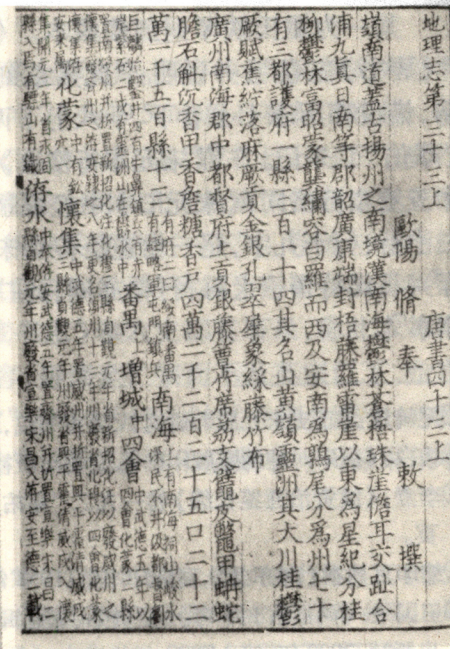
图三(1) 婺州刻本《曾南丰先生文粹》



图三(2) 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旧唐书》



图三(3) 金华刻本《圣宋文选》



图三(4) 宋建本《新唐书》

“正史宋元版书志解题”中有专节作了详细叙述^①,宿白先生在《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一书中也有梳理^②,另外,不少藏书志、藏书目录等都著录了不同版本的《新唐书》。笔者综合了这些著录和前人的研究,将宋版《新唐书》及版本特征等信息排比如下。

嘉祐五年本当是《新唐书》的最早版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载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③。昭仁殿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两个版式相同的本子卷末有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进书衔名,及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版札子。《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宋刻本《南齐书》卷末附刊:“崇文院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同与管勾使臣选择楷书如法书写板样如《唐书》例,逐旋封送杭州开板。治平二年六月日。”^④由此可证《新唐书》写成后确于嘉祐五年下杭州镂版,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出某一特定版本为嘉祐五年本,只能通过后世的覆刻本来了解其版式特征。

王国维曾认为北宋国子监正史,如《史记》、前后《汉书》、南北朝七史及《唐书》皆于杭州镂板,今《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唐书》等尚有北宋监中残本,或南宋重刊监本,皆半叶十行,行十九字^⑤。这里他并未肯定《唐书》就是嘉祐五年的刊本,所著录的行款特征也有待考察。

被后世称为嘉祐本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为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史部记有“《唐书》三卷”,并说明:“此嘉祐刻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板印楮墨甚精,惜仅存历志十七卷下、十八上下两卷,旧为汲古阁藏书,卷首有‘毛褒’、‘华伯’二朱记。”^⑥《宋元本行格表》卷上记此三卷与瞿氏所藏另一部二百二十五卷本行格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记宋嘉祐杭州本《唐书》,称每叶二十行,行十九字,尾三卷逆臣传为宋刻,其余为元明间所刻,同治乙丑五月,嘉兴马氏持售于上海,行格亦同;此三种都被《宋元本行格表》归为宋嘉祐杭州本^⑦。

①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第497-547页。

②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1-32、85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七月戊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4635页。

④缩印百衲本《南齐书》,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28页。

⑤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贾贵荣、王冠辑:《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⑥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二册,第163页。

⑦江标辑:《宋元本行格表》,《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二册,第567页;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第250页。

其二是日本静嘉堂藏本,原为宋人李安诗、清人季振宜、陆心源所藏。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二和《皕宋楼藏书志》卷一九、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史部均记此本,并称其为嘉祐本。该本卷一二至卷一七,卷一五九至一八〇缺佚,实存一百九十七卷。其中卷六八、卷六九、卷一〇一、卷一〇二、卷一三五、卷一三六,皆以南宋刊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本配补。傅增湘记其板框高六寸九分,宽四寸七分,改装后为27.9×17.3cm。其版式为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不等,注双行三十二三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刊工姓名,避讳至仁宗。卷中有“李安诗伯之克斋藏书”、“钱唐梁氏珍藏书画记”、“子子孙孙永用之”、“树德堂子孙宝之”、“梅谷图书”、“申源”、“仲履”、“华伯”、“充庵”、“浦充端印”、“毛褒”、“在在处处有神物护之”、“季振宜藏书”、“沧苇”、“汪士钟印”、“閩源真赏”、“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等印记。陆心源和傅增湘都认为此本和天禄琳琅本同出一版,为《唐书》祖本^①。

其三为昭仁殿藏本,即天禄琳琅本,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卷二著录有“唐书十函一百册”,称此本“行密字整,结构精严”,避讳不及英宗以下,“为嘉祐奉敕所刊之本无疑”,有“乾学”朱印、“徐健菴”白印、“季振宜印”朱印、“沧苇”白印、“季振宜藏书”朱印、“御史振宜之印”白印、“李安诗伯之克斋藏书”朱印、“钱唐梁氏珍藏书画记”朱印、“子子孙孙永用之”白印以及“梅谷图书”、“树德堂子孙保之”白印^②。此本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左右双边,版式与静嘉堂本相同。

其四是日本东京梅泽纪念馆藏本,原藏金泽文库,现存一卷。其版式为每半叶有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双边,一叶27.4×19.5cm,板心有刻工姓名。卷首第一行顶格题“宰相世系表第十一下”,下空十字,题“唐书七十一下”;次行及第三行上空三字,署“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臣欧阳修奉敕撰”;卷尾顶格题“宰相世系表第十一下”。卷首与卷尾栏外,皆有“金泽文库”长方墨印。《日藏汉籍善本目录》称其为嘉祐五年刊本^③。

其五为善本书室藏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史部有著录,称此本每叶三十行,行二十五字,版心窄狭,几不能容,避讳至仁宗而不及英宗以下,殆嘉祐时所镂版,有“汪士钟印”、“閩源真赏”两印,为汪士钟艺芸精舍藏书,并称《天禄琳琅书目》所录即为该书所录之本^④。其实善本书室藏本与天禄琳琅本行款和印记绝不相同,并非同一本。

①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211页;江标辑:《宋元本行格表》,《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二册,第711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216页;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376-377页。

②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影印本,第27页。

③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377-378页。

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第472页。

以上五种所谓的嘉祐本,经研究都不是真正的嘉祐五年刻本。从行款和印记来看,铁琴铜剑楼藏本实为南宋中期魏仲立刊本,则《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所记也非嘉祐本;天禄琳琅本和静嘉堂本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本子,从刻工与避讳可知静嘉堂本是南宋初期按嘉祐本覆刻的,于南宋前期有补刻,梅泽本和静嘉堂本应为同版,但梅泽本可能是原刻,另外日本足利学校的残本也属于同一系统;而善本书室藏本其实应为南宋初期建本,说详下文。因此,天禄琳琅本、静嘉堂本、梅泽本和足利本最能体现嘉祐五年刻本版式特征,即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不等,注双行三十二至三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另外,嘉祐本是下杭州刊刻,推测应当具有浙本字体的基本特征,为整齐的欧体字,覆刻本并不能完全体现原本的字体风格。

除了所谓的嘉祐本,《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著录有一北宋本《唐书》,称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其为原刻者半、修换者半,苏门市中物,有“汪士钟印”^①,不知其真伪,但不能就此指实为北宋本。

现在能看到的宋版《新唐书》主要版本大致可分为四个系统:南宋监本、南宋初期刊本、南宋初期建本、魏仲立刊本。

关于南宋监本《新唐书》,《直斋书录解題》载:“初,吴兴人思溪王氏刻藏经,有馀板以刊《唐书》及《五代史》,置郡庠中。中兴,监书多阙,遂取其板以往,今监本是也。”^②王国维指出,“南宋监本正史,多取诸州郡刻板,如《唐书》、《五代史》取诸湖广,既有明文,其余正史大抵如是。”他所列《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有《新唐书》,记其为南宋监本(湖州刊后取入监),南宋板亡^③。目前所见的南宋监本,是《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七所展示的刻本,框高20.9cm,广14cm,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不等,小字行三十二至三十三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赵万里先生考察后指出,该本首期刻工与湖州本《北山小集》、《思溪藏》和《景德传灯录》多有相同,应为思溪王氏刻本。此版南宋时取入国子监,宋元两朝都有补版,元时版入西湖书院^④。

南宋初期刊本,如前所述,包括了日本静嘉堂藏本、梅泽纪念馆藏本和足利学校藏本,三者是同一系统。张元济先生提到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有与天禄琳琅本和静嘉堂本同式的本子^⑤;尾崎康先生也指出北京图书馆有一个藏本,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左右双边,行格和所谓的嘉祐本相同,版心下方所记刻工姓名也有同于静嘉堂本者^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录有《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刻本,十四行,每行二十四至二十七

①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第253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③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四册,第151、224页。

④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18页,图版六七。

⑤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2页。

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511页。

或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存卷七二中下、卷七四、卷二一五至二二〇,共八卷^①,应当就是此本。

南宋初期建本主要有两个,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卷一六三至一六四、二一二至二一三配明刻本,有傅增湘跋,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现存一百二十四卷^②。此本当是《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史部所著录之《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傅增湘在跋文中称其为北宋刻本,误,他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已作改正,称该本为南宋初小字建本,宋讳桓、慎皆不避;又记该书钤有“欧阳玄印”、“宋景濂藏书印”、“万卷堂印”、“宋筠”、“兰挥”、“雪苑宋氏兰挥藏书记”、“微子世家”各印,及“紫玉玄居宝刻”一印^③。

南京图书馆藏本也有多处著录。傅增湘在记国图藏本时同时提到,南京图书馆亦藏一帙,为钱唐丁氏八千卷藏书楼旧藏,钤有“汪士钟印”(白)、“闽源真赏”(朱)等印,行款与国图藏本全同^④。《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一著录一宋本《唐书》,称其每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九字,汪闽源氏旧藏,今归钱塘丁氏,每册首有“汪士钟印”、“闽源真赏”二印^⑤,《宋元本行格表》亦录此本^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刻本,清丁丙跋,十四行字不一,小字双行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存一百五十五卷,藏于南京图书馆^⑦。《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一六八为此本书影,框高19.3cm,广13.2cm,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注文双行,行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赵万里称其字体娟秀,版式、刀法纯系南宋初年建本风格,宋讳缺笔至“贞”字,当据北宋嘉祐监本翻版^⑧。尾崎康先生对该藏本的版式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记录,该本左右双边,19×13cm,每半叶十四至十六行,行二十五至三十一字不等。从现存各卷来看,本纪是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中国版刻图录》所用的《地理志》是半叶十四行,不过志多是半叶十六行或十五行;传也是从半叶十五行逐渐到半叶十六行。版心白口,双鱼尾,有“己几”之题,没有字数及刻工姓名,避讳并不严格。藏印有“汪士钟印”、“闽源真赏”、“纶音嘉思艺林”、“惠甫寓目”、“八千卷楼所藏”、“八千卷楼藏书印”、“善本书室”。这样,前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的每叶三十行本的《唐书》,当是此本而非嘉祐本^⑨。

魏仲立刊本是南宋中期建本之善者,《新唐书》也刊刻得十分精美。《藏园

①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44页。

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44页。

③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第216页。

⑤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第254页。

⑥江标辑:《宋元本行格表》,《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二册,第728页。

⑦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第235页。

⑧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第36页。

⑨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518-519页。

群书经眼录》卷三著录有《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二卷,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板心上鱼尾下记卷数,下鱼尾下记叶数,目录卷上后有牌字曰“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收书贤士伏幸详鉴”,钤有“项子静家珍藏”(朱)、“季振宜印”(朱)、“汪士钟印”(朱)、“闾源真赏”(白)、“平阳汪氏藏书印”(朱)、“宪奎”(白)、“秋浦”(朱)等印,这是南浔刘君翰怡(承幹)所藏^①。国家图书馆藏有存两卷的十行十九字本,细黑口,左右双边,与《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的魏仲立刊本版式同,印记有“毛褒”、“华伯”等,为汲古阁旧藏^②。前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所录“《唐书》三卷”,实为此本。

上面提到,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个宋绍兴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的《新唐书》,其版式为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也属于宋代江浙地区系统的刻本。

以上对已知宋版《新唐书》的版本特征进行了初步梳理,这将有利于《新唐书·石雄传》残页版本的考证。

三、吐鲁番出土《新唐书》残页的版本及意义

前文已指出该残页的行款,在所有可考的宋版《新唐书》中,大体符合这一行款的有如表一所示的几个版。

表一 十四行本宋版《新唐书》

版本	缺卷及配补	刊刻时间地点	版式特征	避讳	收藏地	备注
嘉祐本		嘉祐五年;杭州	半叶十四行,行23—27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无	
静嘉堂本	卷12至17、卷159至180缺;卷68、69、101、102、135、136配十行本	南宋初年;江浙地区	半叶十四行,行23—27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刊工姓名	至仁宗	日本静嘉堂文库	静嘉堂本、梅泽本、足利本当为一个系统,据嘉祐五年本覆刻。国图本和天禄琳琅本行款同
梅泽本	存卷71	南宋初年;江浙地区	半叶十四行,行23—27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日本梅泽纪念馆	
足利本		南宋初年;江浙地区	半叶十四行,行23—27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日本足利学校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第216—217页。

②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45页;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526页。

(续表)

版本	缺卷及配补	刊刻时间地点	版式特征	避讳	收藏地	备注
国图本一	存卷 72 中、72 下、74、115 至 120	南宋初年	半叶十四行,行 23—27 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国家图书馆	
天禄琳琅本		南宋初年	半叶十四行,行 23—27 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原藏昭仁殿,今不详	
国图本二		宋刻宋元递修;绍兴	半叶十四行,行 25 字,白口,左右双边		国家图书馆	公文纸印本
南宋监本		南宋初年;湖州	半叶十四行,行 23—26 字,白口,左右双边	至仁宗	南京图书馆	原为思溪王氏取大藏经馀版刊刻

据尾崎康和宿白先生对静嘉堂本和南宋监本刻工的统计研究,静嘉堂本原刻叶所见的 55 个刻工姓名中,王成、王昌、王祖、王介、王真、王震等 23 个又见于南宋初期江浙及附近地区所刊的其他书籍;补刻叶所见的 33 个刻工姓名中,董明、董昕、董晖、朱明、章容等 13 个又见于南宋前期临安府、两浙、两淮等地所刊书籍^①。同时,梅泽本和足利本所见的刻工也不出静嘉堂原刻叶所见刻工的范围,因此,这三个版本都可认为属于江浙及附近地区刻本的系统,其初刻年代也可大致认为是南宋初年。

上表构成了一个十四行本《新唐书》的系统,该残页是否可以比定为其中某个版本,或者以一个独立版本纳入这个系统,还需要做更详细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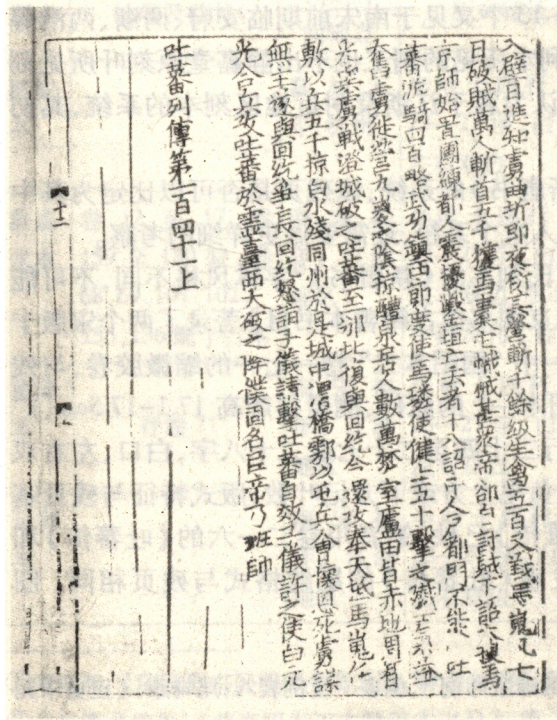
从图版来看,该残页与思溪王氏刻本的《新唐书》^②字体风格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个版本(图四)。另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两个宋版十四行本《新唐书》,笔者查阅了表一中“国图本二”卷一七一的缩微胶卷,与残页不符。又经批准得以看到“国图本一”的原件,测量得版高 17.1—17.5cm,广 12.2cm,行宽 0.9cm;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或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上鱼尾下方记卷数,下鱼尾上方或下方记叶数,版式特征与残页基本相符。由于此本卷一七一《石雄传》已佚,笔者用卷二一六的《吐蕃传》和《突厥传》和残页进行了比对,发现《吐蕃传》的尾题格式与残页相同(图

①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南宋的雕版印刷”,例表一至例表八;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第 502—506 页。

②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七。



图四 思溪王氏本《新唐书》



图五 国图藏十四行本《新唐书·吐蕃传》尾题

五),《突厥传》中“军”、“拜”、“武”等字与残页中对应的字字体极为相似,从整体上看,残页的字体与该本字体也几乎一样。由此,笔者初步断定,该残页所属的版应是宋版,并且很可能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存“国图本一”现存八卷的《新唐书》是同一个版本。也就是说,该残页与天禄琳琅本属同一系统,和静嘉堂本一样能够体现嘉祐本的特点。若此点确实,那么德藏吐鲁番出土的这五个《新唐书》残片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前文所述,这五个残片是裱在刻本《增一阿含经》卷八背面,获取地点不详。在第三次考察所获的《增一阿含经》刻本残片中,有10片出自吐峪沟,分别为 Ch.948 (T III T 530) 卷四二、Ch.1671 (T III T 582) 卷三、Ch.1698r (T III T 438) 卷三八、Ch.1706 (T III T 1248) 卷二五、Ch.1716 (T III T 400) 卷三一、Ch.1721 (T III T 551) 卷九、Ch.1862 (T III T 605) 卷二、Ch.1893 (T III T 570) 卷三、Ch.2924r (T III T 571) 卷二二、Ch.3202 (T III T 538) 卷三一;5片出自高昌故城,分别为 Ch.1780 (T III D 1024) 卷二〇、Ch.1971 (T III D 1032) 卷二二、ChU 7376 (T III D 1039) 卷九、ChU 7413 (T III D 1022) 卷三八、ChU 7515 (T III D 1021) 卷三一;1

片出自木头沟,即 ChU 7453(T III M 132)卷三八,其余不能判明所出^①。由于大多数刻本《增一阿含经》的残片都出自吐鲁番,而且属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写本^②,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个用《新唐书》裱糊的《增一阿含经》刻本也是出自吐鲁番盆地的某个遗址。

《大正藏》的增一阿含部是翻译较早的佛经,在吐鲁番及附近地区发现大量经书残片,正是当地佛教兴盛的表现之一。而获得这些残片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寺院,这些残片当初都是作为寺院图书馆的藏书保存下来的。

当我们把残片的正面《增一阿含经》和背面的《新唐书》视为一个整体,并放到寺院藏书的背景下考察,可以认为,《增一阿含经》是作为佛教经典藏入寺院图书馆的,《新唐书》则是作修补经书之用而裱在背面。这可以从敦煌藏经洞中佛典的保存情况得到证实。

敦煌藏经洞在 1900 年被发现之后,其中的宝藏不断流失,在学者的努力下,确认藏经洞原本分帙封藏着大批佛典,精心保存着信士供养的佛画,还有一些残纸和丝织品残片等。一些绢画和经卷的背面同样裱有纸片,这是古代僧人修复绢画和经卷的痕迹,藏经洞中的残经废纸和丝织品残片,都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和绢画的材料而保存的^③。本文所涉及的五个残片应该也与此类似,只不过作为“废纸”裱佛经的,是今天看来非常宝贵的宋版《新唐书》。而现今极为少见的宋版书在遥远的吐鲁番被发现,不仅可证中原地区与吐鲁番的文化交流状况,而且对宋代版刻的整体考察作出了贡献。

四、结语

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五个《新唐书·石雄传》的残片,拼合后可复原为一个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的刻本残叶,经过对字体和版式的考察,以及对已知宋版《新唐书》版本特征的排比,可证其为宋版中的一页,并极有可能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现存八卷的宋版《新唐书》是同一个版本。

《新唐书》在北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作为唐史史书的正统,被广泛地刊刻传播。这五个残片为我们展示的,一方面是其传播之广已到达吐鲁番及附近地区,另一方面是作为世俗典籍之一的《新唐书》被随意地用来装裱佛经,可以推知寺院僧人的知识结构体系是以佛典为中心来组织的,世俗典籍的收藏,仅属于寺院藏书的次要方面。

①此据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德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统计。

②参看荣新江:《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7-272页。

③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第23-33页。

至此,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增一阿含经》和其背面的《新唐书》残片的印刷时间和地点,以及修补的时间和地点,但它在考察古代佛教僧人的知识结构、寺院的藏书情况等方面,提供了颇为重要的线索。并且,它提示我们,在收集和考察宋版书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在这方面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附记:感谢国家图书馆林世田、史睿两位先生在阅览宋本《新唐书》时提供的帮助。

作者工作单位: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

·书讯·

小勤有堂杂钞(一函四册)

余嘉锡校钞,线装16开,定价680.00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

“小勤有堂”是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的书斋名。是书收录《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历记载籍足征录》、《历代典籍存亡聚散考》、《骀子》、《姓氏总书目》、《国朝史学丛书目录》、《菽匡考古录》、《伊尹事录》、《愧生丛录》、《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等十一种,均为余先生所精心校钞。其中,《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由清顾观光辑,乃《别录》《七略》之异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